

关系等方面,分析了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日本史学史中的影响。^①此外,大门正克、户边秀明、矶前顺一、须田努、三村昌司等学者的研究,分析了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曲折发展后落莫的原因,即以“世界史的法则”与“变革性主体”构成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主导了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在西方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下,日本史学界批判否定了“世界史的法则”,而“主体”经历了从倒退、解体到回归的循环往复,这是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有矛盾,确实值得反思与研究。

结 语

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发轫于明治年间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经过对唯物史观研究的展开,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逐渐以唯物史观指导革命实践,并运用唯物史观开展研究,其发展理路带有强烈的移植性、战斗性与现实性。尽管一度因教条主义、机械主义而遭受抨击,但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仍在不断省思的基础上进行革新,成为日本战后历史学的一个重要派别。随着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及日本社会思潮的迅速转变,马克思主义史学趋于保守,在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学科理论冲击下,被竹内好、子安宣邦等学者的亚洲主义研究和望月清司等学者领衔的“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代替,丧失了原本强势的学术话语权。此后,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及学派难觅其踪。面对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部分日本学者开始呼吁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理性回归。如何重新发挥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培养的批判性与思想性机能、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交流对话、如何以学术介入当下中日关系发展,日本史学界面临新的省思与挑战。

独立后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与局限*

——以阿里格尔学派穆斯林王朝史研究为核心的考察

张恣煜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一、引言

2023年4月,印度国家教育研究和培训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Training,以下简称“国家教培委”)修订了第三版历史教科书,删减了莫卧儿王朝的部分内容。印度独立以来,国家教培委教科书已经对争议最多的莫卧儿史部分进行了数轮修订。如何书写莫卧儿史

^① 参见歴史学研究会編・加藤陽子責任編集『「戦前歴史学」のアーリーナ——歴史家たちの一九三〇年代』、東京大学出版会、2023年。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印度政教关系史视野下的《治世之道》研究”(项目编号:23YJCZH297)的阶段性成果。

也成为当代印度舆论中争议最大的历史编纂话题之一,但争论双方使用的话语并不匹配。第三版套教科书的批评者指责部分历史学家贬损印度历史、伤害民族感情,^①完全是“左派宣传”。^②但是,为第三版教科书中的莫卧儿王朝史书写的辩护者,如参与国家教培委历史教科书编写的罗米拉·塔帕尔(Romila Thapar)^③和莫卧儿史专家伊尔凡·哈比卜(Irfan Habib)等批评印度国内的反对者和主持修订教材的印度政府偏袒宗教社群主义(Communalism)^④和种姓主义。^⑤那么,站在印度之外的中国人如何在具体的研究议题和话语环境中界定印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又该如何评估其对印度历史研究和国民教育的贡献?

得益于中国学者近年来发表的系列研究成果,印度的历史编纂和史学史重新在中国学界获得关注,并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印度的影响。^⑥综合上述研究及克里斯托夫·贾弗雷罗(Christophe Jaffrelot)、西尔维·吉夏尔(Sylvie Guichard)、克日什托夫·依瓦尼克(Krzysztof Iwanek)^⑦等学者的研究可见,尽管世俗立国的理念在独立后的印度有一定的政治基础,但史学家依然需要面对宗教民族主义的挑战和政党执政更替导致的人事变动,而无论印度的学院派史家,还是他们的研究均非存在于政治真空中。

然而,缺乏对非英语和第一手材料运用是当前中国学界研究的不足之一。^⑧英语自19世纪以来逐步成为少数上层精英的通用语,据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全印英语母语者约26万人。^⑨另据一则2021年的报道,全印约26%的学生就读于英语媒介学校,其余74%的学生就读于印地语等非

-
- ① 并非所有学院派史学家都认可此前国家教培委教材对莫卧儿史的刻画。例如,参与编写第二套教科书的德里大学历史系教授米纳克辛·贾殷(Meenakshi Jain)曾批评第一套国家教培委教科书刻意回避穆斯林王朝毁坏寺庙、对非穆斯林王朝关注不足等问题。Meenakshi Jain, *Flawed Narratives: History in the old NCERT Textbooks*, <https://archive.org/details/flawed-narratives-history-in-the-old-ncert-textbooks-of-satish-chandra-by-meenakshi-jain> [2023-12-16]
- ② 例如DNA Web Team, “NCERT Bbook Cclaims Aurangzeb Ggave Ggrants to Rrebuild Ttemples but hhas Nno Info on Source”, DNAINIA.com, <https://www.dnaindia.com/india/report-ncert-book-claims-aurangzeb-gave-grants-to-rebuild-temples-but-has-no-info-on-source-2868247> [2023-12-16]
- ③ 塔帕尔的学术生涯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学术倾向。其早期著作有比较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特点,但在近年的公开发言中,塔帕尔并未就自己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表态。不过,这不妨碍批评者一直以“马克思主义者”攻击塔帕尔。
- ④ 宗教社群主义在南亚政治和社会语境中特指宗教、种姓等身份群体间隔阂与冲突。参见Gyanendra Pandey,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alism in Colonial North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⑤ Sounak Mukhopadhyay, “Historians ‘appalled’ by NCERT Trying to Make History Textbooks ‘One-Sided’”, *livemint.com*, <https://www.livemint.com/news/india/historians-appalled-by-ncert-trying-to-make-history-textbooks-onesided-11681006405891.html> [2023-12-16]
- ⑥ 宋丽萍:《印度独立以来历史教科书问题与教、俗之争》,《世界历史》2005年第6期;王立新:《现代印度史学的谱系和趋向》,《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4期;张旭鹏:《“庶民研究”在拉美:对一种印度史学理念的跨文化考察》,《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4期。其中,宋丽萍围绕历史教科书的争议,展现了独立后印度历史研究的政治文化语境。
- ⑦ Christophe Jaffrelot, *The Hindu Nationalist Movement and Indian Politics: 1925 to the 1990s*, Penguin Books, 1999; Sylvie Guichard,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y and Nationalism in India: Textbooks, Controversies and Politics*, Routledge, 2010; Krzysztof Iwanek, “The Textbook of Chanakya’s Pupils: Vidya Bharati and Its Gauravśāli Bhārat Textbook in Uttarakhand”, *Archiv Orientalní*, Vol. 83, No. 2, 2015, pp. 255–280.
- ⑧ 少数使用非英语一手史料的研究,如,乐石滢:《印度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南亚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1期;张志煜:《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Hindu族群建构与印度历史书写》,《北京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尽管印地语、波斯语、梵语尚不足以全面涵盖印度史料,但依然是拓展史料来源的重要一步。
- ⑨ 由于官方网站历史网页失效,2011年人口普查相关数据可参见Statista, “Most common languages spoken in India in 2011”,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616508/most-common-languages-india/> [2023-12-16]

英语学校。^①因此,将目标局限于英语文本必然导致忽视相当部分的印度人历史认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行为。这不仅削弱印度历史研究的现实意义,更无形中重复了殖民学术以“理性”“文明”名义贬低地方知识传统的错误。^②此外,如果对印度史学的研究止步于对个别成名史学家的成果探讨,不尝试与使用第一手史料的印度史学家直接对话,将难以继续深化对印度历史书写、编纂。

因此,本文将聚焦以下研究对象和问题,以期补充现有研究关于独立后印度历史书写、编纂和研究的更多讨论。第一,为全面考察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独立后印度的政治和思想语境,本文研究对象不限于在英语学界知名度较高的学院派史学家著作,而将不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但对公众印度史认知影响较大的文学、大众文化和政论中的历史书写纳入其中。第二,本文除采纳左派史学家的观点外,也将结合政治史对印度教右翼政治的研究,以思考为何曾一度抵消宗教民族主义冲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未能全面扭转印度各界对印度教、民族、国家的认识。^③第三,本文将重点关注近年来印度国内史学争论最激烈、最政治化的北方穆斯林王朝史,尤其是莫卧儿史研究。

二、印度左翼政治与马克思主义知识生产

在分析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代表及其成果前,有必要梳理现代印度政治生活中广义的左翼政党,以及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各类知识生产。在现代印度政党政治的语境中,左翼力量包括印度各共产党组织以及不同程度上认同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其他政党。印度从海外建立党组织并逐渐向国内发展的过程中主要依托城市知识分子开展活动,并受到苏联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影响。^④印共国大党原本在争取民族独立问题上立场一致。但是,二战期间印共受共产国际指示支持英国将印度卷入二战的决策使其饱受民族主义者批评。1947年印度独立后,印共内部就是否与国大党合作、是否参与议会政治等问题争论不休,派系斗争愈演愈烈。^⑤

印度还存在印共之外的左翼政党力量,其中尤以贾亚普拉卡什·纳拉扬(Jayaprakash Narayan)等左翼人士于1934年在国大党内成立的国大社会党(Congress Socialist Party)影响最大。1948年,国大社会党脱离国大党成为独立的社会党(Socialist Party)。^⑥1952年,社会党与农工人民党(Kisan Mazdoor Praja Party)合并,组建人民社会党(Praja Socialist Party)。1955年,人民社会党分裂,拉姆马诺哈尔·洛希亚(Rammanohar Lohia)及其支持者另组统一社会党(Samyukta Socialist Party)。此后,

① Rema Nagarajan, “26% of schoolkids in English medium; nearly 60% in Delhi”, *Times of India*, July 3, 2021,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26-of-schoolkids-in-english-medium-nearly-60-in-delhi/articleshow/84082483.cms> [2023-12-16]

② 关于打破语种和文类隔阂以更好地探讨印度社会的知识和思想生产,参见张恣煜:《文学与历史的“互为语境”——达尔米亚〈虚构亦历史:现代北印度的长篇小说与城市〉评述》,《外国文学》2020年第1期。

③ 除上文提到的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外,还可参见下列使用了大量非英语一手史料的研究,如 Christopher Rolland King, *One Language, Two Scripts: The Hindi Movement in Nineteenth Century North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Vasudha Dalmia, *The Nationalization of Hindu Traditions: Bhāratendu Hariśchandra and Nineteenth-Century Banaras*, Permanent Black, 2010; Francesca Orsini, *The Hindi Public Sphere 1920-1940: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Nation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④ 有关印共早期历史,参见张淑兰:《印度政党政治中的左翼政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⑤ 王静:《印度共产主义运动视野中的印共(毛)》,《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9期。

⑥ Narendra Kumar Singh and Anand Prakash Singh, “Congress Socialist Party’s Separation From The Congress (1946-48): A Socialist Point of View”, *Proceedings of the Indian History Congress*, Vol. 63, 2002, pp. 819-826.

统一社会党人又先后组建了反对国大党的印度民众党(Bharatiya Lok Dal)和老人民党(Janata Party),并在1977年首次取代国大党执政。20世纪80年代之后兴起的许多反对党都以社会主义者自居,曾于1988年短暂执政的新人民党(Janata Dal)此后又分裂为多个小党。^①

由此观之,印度缺乏有力的左翼政党,即便相对统一的印共内部也存在多重分歧和矛盾。^②左翼运动的碎片化对国情复杂、文化多样的印度传播及本地化马克思主义造成了不利影响。即便如此,除党组织的政治宣传外,以印共党员作家为骨干的进步知识分子依然组建了全印进步作家协会(All-India Progressive Writers Association)和印度人民戏剧协会(Indian People's Theatre Association),并在开展面向大众的文艺活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但是,历史研究有自身的学科专业门槛,由于史料传承和历史书写缺乏连续性等问题,加之英国19世纪以来建立的殖民史权威支配了殖民时代专业的印度历史研究,故印度知识分子缺乏与殖民史学抗衡的本土史学。因此,反对英国殖民史学支配的印度学者和思想家,或选择前往法国、德国等国学习,绕开英印帝国史,^③或走向殖民帝国史的另一个极端,即以非历史主流的宗教文化史书写取代帝国史研究。^④不过,无论是“大印度”民族—帝国史,还是宗教文化史,都与马克思主义基本世界观和方法论有别。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印度历史书写研究的结合需另辟蹊径。

尽管不乏西式精英,但西式教育在北印度印地语区的渗透程度相比加尔各答、孟买等首府城市相对较低。这固然对通过英语传播马克思主义构成了挑战,却也在客观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1925年印共坎普尔会议便有北方干部尝试将共产主义等理念转换为更加本地化的表达,^⑤但更加成功地融合当属印地语进步作家、佛教史研究者罗浮洛·桑克利迪耶那(Rahul Sankrityayan)的《从伏尔加河到恒河》(Volga se Ganga)。^⑥这部有小说色彩的著作尝试将唯物史观与印度历史语境相结合,不仅在标题上体现苏联和印度关系,更直接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⑦该书首版后很快售罄,也是印共历史上少数将民族语言知识分子的著作翻译为英语的情况。但是,文学创作中的历史书写终究不是专业历史研究。印度政府对左翼文化运动的打击也限制了这种自下而上的知识

① 包括人民党(联合派)(Janata Dal (United))、人民党(世俗派)(Janata Dal (Secular))、国家人民党(Rashtriya Janata Dal)、社会主义党(Samajwadi Party)和比朱人民党(Biju Janata Dal)等。

② 除政治路线和派系斗争外,印度左翼运动也未能完全摆脱印度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种姓隔阂、知识分子与工农的阶级隔阂以及熟练英语的双语知识分子与主要使用民族语言的知识分子间的文化隔阂。参见吴晓黎:《社群、组织与大众民主——印度喀拉拉邦社会政治的民族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5页;Sharankumar Limbale, *Towards an Aesthetic of Dalit Literature: History, Controversies and Considerations*, trans. Alok Mukherjee, Orient BlackSwan, 2004, p. 62; 任筱可:《印地语进步主义小说中的种姓批判——文学生产与马克思主义印度化》,《外国文学动态》2023年第1期。

③ Susan Bayly, “Imagining ‘Greater India’: French and Indian Visions of Colonialism in the Indic Mode,”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38, No. 3, 2004, pp. 703–744.

④ 有关宗教如何成为印度知识分子构筑民族主义思想的阵地,可参见帕尔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对般吉姆·钱德拉·查特吉(Bankim Chandra Chatterjee)和圣雄甘地的研究。帕尔塔·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范慕尤、杨曦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67—180页;张恣煜:《泰戈尔〈格比尔百咏〉对印度神秘主义思想史的建构》,《国外文学》2018年第1期。

⑤ Charu Gupta, “‘Hindu Communism’: Satyabhakta, Apocalypses and Utopian Ram Rajya,” *The Indian Economic & Social History Review*, Vol. 58, No. 2, 2021, pp. 213–248.

⑥ 该书共分为19个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章节,分别讲述特定历史语境中印度人的生活。中译者恰如其分地称该书“是一本文学书,也是一本历史书”,并将中译本标题定为《印度史话》。参见罗浮洛·桑克利迪耶那:《印度史话》,周进楷译,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页。

⑦ 桑克利迪耶那:《印度史话》,第402—407页。

生产转化为更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独立后的印度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主要是另一个知识谱系的产物,即接受过严格史学学术训练、主要以英语开展学术研究的“盎格鲁—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

三、盎格鲁—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

位于今印度北方邦的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 (Aligarh Muslim University) 是印度的莫卧儿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重镇。以该校得名的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阿里格尔学派” (Aligarh school)^① 是下文探讨的重点对象之一。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的前身是创立于 1875 年、旨在推进西式现代教育的穆斯林盎格鲁—东方学院 (Mohammadan Anglo-Oriental College)。因此,不妨借鉴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前身的名字,将印度这种有自身特点的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史学称作“盎格鲁—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

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以提升印度穆斯林教育水平为己任,但其师生构成并不限于穆斯林。得益于穆斯林学者世代传承的印度—波斯语史学和伊斯兰知识,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在莫卧儿王朝史的北方穆斯林王朝史研究方面形成了学科特色。印度—波斯语史书多以穆斯林王朝统治者的军事政治活动为中心,并在一定程度上兼顾疆域内的风土人情。至莫卧儿王朝中期,印度—波斯语史书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历史主线叙事。其一为“伊斯兰征服”叙事,即将印度史视为自先知穆罕默德以来伊斯兰教不断拓展影响、消除蒙昧的一部分。其二为以“国家” (daulat)^② 为主体、更世俗化的历史叙事。后者尤以阿克巴的重臣阿布—法扎勒·伊本·穆巴拉克 (Abu'l-Fazl ibn Mubarak) 编写的《阿克巴纪》 (Akbarnama) 为代表,重点关注莫卧儿君主与分裂势力的矛盾冲突。^③ 相比“伊斯兰征服”叙事,这种“国家史”视角可更好服务于如阿克巴那样希望有效驾驭信仰不同的贵族和臣僚,进而巩固统治的君主。此后,沙·贾汗编年史《帕迪沙纪》 (Padshahnama) 的作者阿卜杜勒—哈米德·拉合利 (Abdul Hamid Lahori)、《精华选集》 (Muntakhab-al Lubab) 的作者哈菲·汗 (Khafi Khan) 均受阿布—法扎勒影响。^④ 殖民史学在构建“英印帝国史”的过程中也曾学习、借鉴了印度—波斯语史学。^⑤

阿里格尔的历史学家穆罕默德·哈比卜 (Muhammad Habib) 是以唯物史观开拓印度穆斯林王朝史研究的学者。哈比卜出生于勒克瑙一个接受西式教育的律师家庭,他在完成本科学业后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1922 年起,他于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历史系任教,并成为学派代表人物。此时的印度史学界尽管存在以多元文化帝国为主体的历史研究,但“作为殖民知识体系的宗教社群主义”导致印度历史研究一直难以摆脱宗教冲突论,尤其限制了对印度穆斯林王朝史的客观研究。^⑥ 在 20 世纪

① 有关“阿里格尔学派”作为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派之一的基本情况和学术贡献,参见 Daud Ali,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Medieval in South Asi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 22, No. 1, 2012, pp. 7–12。

② Daulat 一词源于阿拉伯语,历史上的阿拉伯帝国以及与莫卧儿同时代的奥斯曼帝国均以此自称。

③ Noman Ahmad Siddiqi, “Shaikh Abul Fazl”, in Mohibbul Hasan ed., *Historians of Medieval India*, Aakar Books, 2018, p. 143.

④ Mohibbul Hasan, “Introduction”, in Mohibbul Hasan, ed., *Historians of Medieval India*, Aakar Books, 2018, p. vii.

⑤ Blain Auer, “Early Modern Persian, Urdu, and English Historiography and the Imagination of Islamic India under British Rule”, *études de lettres*, Vol. 2–3, 2014, pp. 204–205.

⑥ Gyanendra Pandey,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alism in Colonial North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40年代的印、穆冲突与巴基斯坦建国运动中,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师生分化为支持巴基斯坦建国和反对印巴分治的两派。^① 哈比卜正是在这一时代乱局中转向了马克思主义。1947年印度独立后,对哈比卜等反对印巴分治并留在印度的阿里格尔学者,尤其是穆斯林学者来说,如何进一步构建世俗主义意识形态不仅事关印度国家命运,对独立后作为宗教少数派生活在印度的穆斯林群体来说更是至关重要。^②

阿布-法扎勒的印度-波斯语“国家史”为世俗化穆斯林王朝史的继续研究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即将关注重点由宗教冲突,转向宗教冲突背后的贵族利益冲突。例如,阿里格尔学派历史学家萨迪什·钱德拉(Satish Chandra)发表于1959年的首部专著《莫卧儿宫廷的党派与政治 1707—1740》便深入考察了政治精英内部的现实利益冲突如何导致帝国走向衰落。^③ 1960年,穆罕默德·哈比卜重新在阿芙萨尔(Afsar)^④的研究手稿基础上校译德里苏丹国时期的波斯语著作《治世之道》(*Fatāwā-i-Jahādārī*)。^⑤ 如果比较该书的波斯语原文、阿芙萨尔的博士学位论文和哈比卜的校译本可以发现,哈比卜大刀阔斧地对《治世之道》进行了世俗化改造。他基本删去了原书作者齐亚丁·巴拉尼(Ziauddin Barani)对伊斯兰教与国家制度关系的讨论,突出了其并不严格要求苏丹严格按照教规生活的观点,提出巴拉尼主张建立“王法”与“教法”分离的世俗国家制度。^⑥ 对巴拉尼在原书中歧视甚至咒骂印度教徒的观点,哈比卜或大幅删减,^⑦或转用阶级冲突加以解释。^⑧ 考虑到哈比卜所处的政治环境,他的诠释和删节并非不能理解,但违背了历史研究需要尊重原始史料的基本立场。

相比之下,穆罕默德·哈比卜的儿子伊尔凡·哈比卜(Irfan Habib)却更充分地发挥出了印度一波斯语史料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长处。莫卧儿王朝保留了更多土地税收相关史料,马克思主义史学对经济和下层民众生活的关注,帮助伊尔凡·哈比卜在代表作《莫卧儿印度的农业制度 1556—1707》中重新思考“帝国兴衰”这一帝国史议题,并指出帝国不断调整军功贵族名为“贾吉尔”(jāgīr)^⑨的俸地,导致后者过分汲取农村产出,进而引起帝国的衰落。^⑩ 相比其父亲对阶级冲突理论的机械应用,伊尔凡·哈比卜的研究以更加专业的史料分析能力,将阿布-法扎勒以来“世俗国家史”关注“中央—地方”冲突拓展为统治集团与被统治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体的冲突。

20世纪60年代,印度中央政府组建国家教培委,重新编写印度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历史学家钱德拉负责11和12年级教材《中世纪印度》。在这部教科书中,钱德拉充分吸纳了他自己的莫卧儿宫

-
- ① Shan Muhammad, *Education and Politics: From Sir Syed to the Present Day the Aligarh School*, A. P. H.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2.
- ② 尽管圣雄甘地、尼赫鲁等国大党领导人认为独立后的印度应当包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宗教少数派,但事实上即便在国大党执政时期也存在对穆斯林的制度性歧视和压制。参见张恣煜:《印度穆斯林的现状、困境与思考》,《中国穆斯林》2021年第3期。
- ③ Satish Chandra, *Parties and Politics at the Mughal Court 1707 - 1740*,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59.
- ④ 这名学者在不同阶段使用过不同的名字,本文统一使用阿芙萨尔。
- ⑤ Mohammad Habib, Afsar Umar Salim Kha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Delhi Sultanate (Including a Translation of Ziauddin Barani's Fatawa-i Jahandari, Circa, 1358 - 59 A. D.)*, Kitab Mahal, 1960.
- ⑥ Mohammad Habib, Afsar Umar Salim Kha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Delhi Sultanate (Including a Translation of Ziauddin Barani's Fatawa-i Jahandari, Circa, 1358 - 59 A. D.)*, p. vi.
- ⑦ Mohammad Habib, Afsar Umar Salim Kha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Delhi Sultanate (Including a Translation of Ziauddin Barani's Fatawa-i Jahandari, Circa, 1358 - 59 A. D.)*, p. 6.
- ⑧ Mohammad Habib and Afsar Umar Salim Kha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Delhi Sultanate (Including a Translation of Ziauddin Barani's Fatawa-i Jahandari, Circa, 1358 - 59 A. D.)*, p. v.
- ⑨ 有关莫卧儿王朝时期的贾吉尔制度,参见黄思骏:《印度土地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4—171页。
- ⑩ Irfan Habib, *The Agrarian System of Mughal India 1556 - 1707*,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廷政治和伊尔凡·哈比卜的土地制度研究等阿里格尔学派学术成果。例如,分析奥朗则布在位期间莫卧儿帝国如何由盛转衰时,钱德拉主张在具体政治语境中理解奥朗则布歧视非穆斯林的政策,并提出了以下与殖民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有别的观点:在印度教徒发动叛乱的情况下,奥朗则布只好对其加以惩罚;^①奥朗则布在继位战争中需要乌莱玛的支持;^②奥朗则布重新向非穆斯林征收名为“吉齐亚”(jizya)的税,并非以经济手段迫使印度教徒改教,而是为了争取穆斯林对自己的支持。^③钱德拉并不认为莫卧儿帝国衰落的原因完全在于奥朗则布个人,在他看来,莫卧儿贵族之间的矛盾、贾吉尔不足和对农民的过分盘剥都是莫卧儿帝国内部更深层次的问题。^④

阿里格尔学派的历史学家们以马克思主义“世俗国家史”史学范式冲破了殖民时代以来宗教冲突论的桎梏,为重新理解北印度穆斯林王朝史提供了新视角。在这种新视角的驱动下,土地税收等相关史料被纳入政治史研究,并为解释帝国的兴衰提供了新论据。日后,伊尔凡·哈比卜还顺着唯物史观的脉络,进一步发展了对农耕、纺织等领域技术的研究。^⑤时至今日,莫卧儿史研究依然在跨学科史料运用方面较其他王朝研究有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阿里格尔学派的思想解放和务实研究。

四、盎格鲁—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危机

创新扎实的莫卧儿史研究为阿里格尔学派赢得了史学同行的尊重,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逐渐成为统编历史教科书的主导思想离不开政府支持。然而,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不同,印度独立后主导政局的并非共产党,而是意识形态混杂且日益呈现家族政治色彩的国大党。这也就使得盎格鲁—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面对印度政治造成的独特环境。

即便对曾经一党独大的国大党执政集团来说,强化中央集权、压制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党内各地方实力派也是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包括阿里格尔学派在内的盎格鲁—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文化多元的中央集权国家历史的论述产生于这一时期并得到支持,这并非偶然。与之对照的是,普鲁肖坦达斯·坦登(Purushottamdas Tandon)等国大党内反对派也转而支持原本就得到党内保守派同情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⑥20世纪60年代印共分裂、印共激进派不再与国大党合作后,与国大党政府合作开展历史教育的盎格鲁—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陷入了另一重尴尬境地。面对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不断攻击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印度史研究的情况下,保持与国大党中央政府合作,而非如印共激进派一样转向更激进的大众政治和文化运动就成为盎格鲁—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选择。

1972年,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努尔·哈桑(Nurul Hasan)出任由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政府的教育部部长。与尼赫鲁—甘地家族的日益绑定为史学研究和成果推广争取了中央政府的支持,但随着印度政治由国大党一党独大转向多党政治,这

① Satish Chandra, *Medieval India: A Textbook for Classes XI – XII, Part II*, NCERT, 1983, p. 213.

② Satish Chandra, *Medieval India*, p. 215.

③ Satish Chandra, *Medieval India*, p. 217.

④ Satish Chandra, *Medieval India*, pp. 239 – 240.

⑤ Irfan Habib, *Technology in Medieval India, C. 650 – 1750*, Tulika Books, 2013.

⑥ Krishna Kumar, “Hindu Revivalism and Education in North-Central India”, *Social Scientist*, Vol. 18, No. 10, 1990, p. 22.

种绑定反过来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印度的进一步发展。

如前所述,受历史唯物主义启发的世俗帝国史让穆斯林王朝史摆脱了宗教史桎梏,但过分突出阿克巴治下世俗且中央集权的莫卧儿帝国的中心地位也导致了新的桎梏。第一,“莫卧儿中心论”限制了对印度其他区域历史的研究。^① 第二,对宗教史观的担忧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因此完全否认宗教文化在印度社会中的客观存在及影响则有违客观治学的精神,更不用说用简单化的经济、阶级决定论解释一切与宗教、文化有关的历史现象。^② 第三,执着使用欧洲史引入的“中世纪”概念限制了印度从15世纪后即被纳入全球贸易体系的“早期现代性”讨论。^③

左翼政治的分裂削弱了盎格鲁—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大众的能力。印共原本就没有史学组织,即便是能向大众传递进步思想文化的文艺组织在印共分裂后也陷入分裂甚至瘫痪状态。相较之下,得到国大党党内反对派和其他反对党支持的国民志愿服务团则在拓展基层教育网络方面取得了更大进展。^④

冷战后的印度国内外形势进一步动摇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政治经济基础。1991年,国大党政府正式转向学习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其也从“独大党”变成了主要政党之一。虽然历史上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与亲西方自由主义者间存在意识形态和现实利益的隔阂,但21世纪以来,印度人民党成功在国内协调了印度教民族主义与财团资本之间的矛盾,在国外进一步深化了印美关系,两者在知识领域反而愈发形成合力,逐渐主导了印度历史研究理事会、国家教培委等机构。2014年莫迪领衔的印度人民党执政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进一步以“反国家”“同情恐怖主义者”等标签污名化和打压马克思主义者,政治色彩浓厚的学生会会在“左翼学术的最后大本营”尼赫鲁大学制造多次激烈冲突。尽管哈比卜等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依然为自己的学术信仰及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发声,但无论学术号召力还是大众号召力,盎格鲁—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均已经不复之前的盛况。

结 语

盎格鲁—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演变同时是印度共运史的缩影。印度共产党人面对严密的殖民地国家机器,容易受到苏共和英共的外部干预,而印度社会复杂多样的阶级、语言、宗教和种姓隔阂也从内部削弱了其力量。综上所述,盎格鲁—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致力于开展专业史学研究遏制宗教民族主义,以及在印度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中保证生存。其最终衰落也是印度独立后,尤其是冷战后

① 在莫卧儿史研究中,也存在更关注北印度东部能动性的安拉阿巴德学派,更不用说南方史学家对印度史教学自殖民时代以来就存在的“北方中心主义”的不满。早在殖民时代,南印度历史研究者已经依托南方的考古发现和文献史料,尤其是达罗毗荼语文献探索“非雅利安”的南方历史书写。如 K. A. Nilakanta Sastri, *A History of South India: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the Fall of Vijayanag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② 如德里大学历史系的拉齐丁·阿奎尔(Raziuddin Aquil)一书中在批评阿里格尔学派过分漠视宗教的基础上,不仅揭示了苏菲派与政治的互动,并追溯了莫卧儿人进入印度之前阿富汗裔穆斯林对印度宗教和政治发展的贡献。参见 Raziuddin Aquil, *Sufism, Culture, and Politics: Afghans and Islam in Medieval North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③ Sanjay Subrahmanyam, “The Mughal State—Structure Or Process? Reflections On Recent Western Historiography”, *The Indian Economic & Social History Review*, Vol. 29, No. 3, 1992, pp. 291–321。

④ 1977年,国民志愿服务团在全国层面成立了知识协会,以统筹其创办的学校。根据其官方网站的数据,截至2022—2023年度,知识协会在全国拥有正式学校12065所,在读学生315万8658人。Vidya Bharati Akhil Bharatiya Shiksha Sansthan, “Status of Work in Session: 2022–23: At a Glance”, <https://vidyabharti.net/status-work-session-2022-23-glance> [2023–12–16]

的印度政治由“社会主义—世俗主义”转向“新自由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的结果之一。

尽管如此,盎格鲁—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印度历史研究的贡献和影响依然不容否定。在学术研究方面,无论上文提到的拉齐丁·阿奎尔(Raziuddin Aquil)、桑贾伊·苏布拉马尼亚姆(Sanjay Subrahmanyam)等在印度接受教育的历史学家,还是约翰·理查兹(John Richards)、理查德·伊顿(Richard Eaton)等海外学者,在他们对莫卧儿史乃至印度史研究中都不难发现伊尔凡·哈比卜等阿里格尔历史学家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盎格鲁—印度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挫败并非马克思主义在印度的失败。在文艺创作和批评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元素和实践依然以各种形式活跃于当今印度,未来可以为探讨马克思主义在印度的传播和本地化开启新话题。

戈登·柴尔德与马克思主义史前史的理论探索与实践

倪 凯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戈登·柴尔德是20世纪最著名和被引用最多的史前考古学家,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和史前史研究最早的倡导者。柴尔德对西方考古学与史前史研究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大多数欧洲考古学家视其为史前欧洲文化史的权威专家;在美国他被认为是他所处时代第一流的文化进化论者,在拉丁美洲他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最主要的支持者。^①柴尔德的马克思主义史前史研究不同于苏联的原始社会史研究,形成了自己独特阐释框架,这种阐释框架虽然没有形成一个学术流派,但他提出的很多概念、理论被后世史前史家广泛借鉴与引用,并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过程主义考古学理论中复苏。大卫·哈里斯认为,柴尔德的工作和生平实际是史前史这门学科兴起过程的集中反映。^②

一、柴尔德马克思主义史前史的研究转向

马克思主义史前史研究始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起源、人类发展进程及原始社会的研究。19世纪后半期,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的“均变论”、前亚当时代人类化石的发现及达尔文的进化论,突破了神学创世论对人类史前观念的束缚,使史前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蓬勃发展起来。这一时期丹尼尔·威尔森(Daniel Wilson)、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加布里埃尔·德·莫尔蒂耶(Gabriel de Mortillet)、爱德华·泰勒、摩尔根等撰写了一批史前史研究著作。^③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到这一时期的史前史研究成果,他们相信人类历史进步的普遍性,这与达尔文、摩尔根、斯宾塞以及

① Randall H. McGuire, “Archaeology and Marxism”,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Vol. 5, 1993, pp. 101–157; David R. Harris, *The Archaeology of V. Gordon Child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p. 9; Bruce G. Trigger, *Gordon Childe Revolutions in Archae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0.

② David R. Harris, *The Archaeology of V. Gordon Child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 p. 1; 布鲁斯·G. 特里格:《柴尔德的考古学革命》,何传坤、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70页。

③ Glyn Daniel, *The Idea of Prehistory*,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2, pp. 41–58; Donald R. Kelley, “The Rise of Pre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 14, No. 1, 2003, pp. 17–36; A. Vayson De Pradenne, Ernest F. Row, *Prehistory*, George G. Harrap & Co. Ltd., 1940, pp. 11–14; Colin Renfrew, Paul Bahn, *The Cambridge World Pre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3–4.